绪　论

一、课题意义

(一)选题原因

城市化或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它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工业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西方工业文明之前，人类社会主要聚居在乡村，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聚居在城镇的人口越来越多，城镇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早已超过了农村人口，实现了城市化。

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经济越发达，城市化水平越高；反之，经济越落后，城市化水平就越低。同时，城市化水平也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都把推进城市化作为发展本国经济和走向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政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2000年底，我国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城市化水平只有 36.09%，也就是说，我国有近 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此众多的人口居留在农村，既不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长期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我国 21世纪头 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为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目标，为了实现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我国正在推行积极城镇化政策。2000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十五”期间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的重大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指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可见，“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①。

城市化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发生质变——从传统乡村文化向现代都市文化转变。城市化进程导致民族传统文化发生急剧的变迁，导致外来文化对

①世界银行：《2020 年的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年，第 1 页。

本土文化的冲击，甚至使优秀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变得异常困难。目前，世界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遭遇到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强烈冲击，正面临着应付急剧的文化变迁所提出的严峻挑战。城市化进程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变迁，已成为当今公认最富有时代感和挑战性的课题之一。在当前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背景下，笔者选择了城市化与文化变迁这个热点作为研究主题，并将四川藏区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载体，纳入研究对象。

四川藏区主要包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四川藏区的主体，它们即为本书所指的“四川藏区”。

四川藏区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国家工业化布局向西部迁移的“三线建设”的影响，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城镇大多由此起步。但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不在该地区，所以“三线建设”对四川藏区城镇发展的作用较小。四川藏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这时，四川藏区的城镇化进程以前期工业建设成果为依托、以经济发展为支撑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围绕城镇中心的发展，进行了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经济转换的同时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看到众多变化，如人们交往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宽，交往对象越来越广，常常与一些互不相干的组织、角色和人群打交道。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淡漠。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功能现在逐渐由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接替了，如许多的家庭娱乐活动，现在大都在服务行业中进行，甚至人们也越来越习惯在饭店里进餐、在茶楼里喝

茶了，子女教育也主要由学校而不再是由家庭负责，人们工作、消闲和休息的地方发生了分离，不再像以前那样全部在家里进行。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些需要经济帮助的人会求助于公共福利机构和民政部门而不完全像以前那样依靠乡邻相助了。由于城镇不可能像农村那样自给自足，因而不同地区城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如某个城镇的居民所消费的电视或移动电话，就可能产自国内遥远的地方甚至国外。而且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影响越来越明显，社区之间的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在当今的四川藏区，人们追求的是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地的时尚，外来文化对四川藏区越来越起着一种主导作用，通过大众媒介，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时尚和价值观念已深深地影响着四川藏区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

近年来，四川藏区一直都在忙于应付日益扩大的城乡对流和急速的文化变迁，并一直在实践中寻求适合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造成的原因，四川藏区尤其是偏远的农牧区，与中国西部所有后进地区一样，还难以很快和彻底地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更难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迈出大的步子，其落后状况不仅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全国整体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此，国家试图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投入的倾斜来加速西部地区的转变和发展的进程，其中当然也包括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四川藏区应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遇，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步伐，并充分发挥各类城镇的辐射功能和市场整合作用，促进乡村经济结构调整，以迅速完成该地区的全面转变；促进文化的现代化，确立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道路。

城镇化是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加速城镇化进程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条根本途径。在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保护和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调适文化冲突，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的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城镇化和民族文化的良性互动发展。就四川藏区而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这些构成了本书研究的现实背景，也是本书立论的基本依据。

（二）目的与意义

本书的研究目的：系统研究四川藏区的城镇化进程，揭示其现状、特点、趋势、影响及原因，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有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观察和记录四川藏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变迁发生的实际过程，研究城镇化对该地区文化变迁的作用和影响，了解城乡发展变化的相关性和互动作用，从中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探讨文化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和途径，促进四川藏区城镇化进程与文化变迁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本书的理论意义：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各民族文化多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本书通过对四川藏区这一特定民族区域的城镇化进程、文化变迁及其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的研究，来探索两者协调发展的途径。本书把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借此研究现代化背景下四川藏区的城镇居民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有助于探索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道路，有助于探索四川藏区城镇文化的发展规律，有利于丰富民族地区文化研究的内容，有助于推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的欠发达地区中小城镇文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代化建设理论框架。本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书的实践意义：从现实角度来看，本研究不仅可以为民族地区的城镇及乡村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实际的经验与可供选择的路子，而且可以为民族地区在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调适文化冲突、发挥自身优势等方面，提供一些思路和启发。同时，就如何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速民族地区的城市（镇）化进程和文化现代化建设，为决策部门及当地政府及时地提供有关信息、政策咨询和参考意见。此外，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以及资料，对未来的同类研究也有参考价值。因而，本研究还富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理论和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本课题的指导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笔者首先从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即生产方式出发，考察人们的谋生手段，考察人们的消费方式，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如教育、宗教信仰、婚姻与家庭、风俗习惯等内容。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城市的论述，对于本课题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关于社会分工与城乡对立，马克思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① 关于农业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4—25 页。

多学科综合研究是本课题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是民族学方法，对民族地区、某一民族进行研究，这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本职工作，因此民族学方法是本课题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同时，还借鉴了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这是因为，城镇化进程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且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必然要考察该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当代民族文化，是在历史上逐步积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因此，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社会学与民族学关系密切，研究民族文化，自然要借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同时，要想从整体上把握一个特定区域内某一民族的状况，我们还应用了统计学的理论方法。由于城镇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中心或增长极，因此对城镇文化的研究要运用经济学和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即用城镇化理论研究城镇社会形成的条件、动力、模式、特点；用城市社区理论研究藏区城镇社会的人口、婚姻、家庭、职业结构；用文化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城镇文化的传播、冲突、调适及变迁。

（三）具体方法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民族学传统的研究方法，即实地调查。在西方民族学中，民族学实地调查被通常称为人类学田野工作。实地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研究资料最基本的途径，是“民族志”即“记述民族学”的构架的源泉。美国人类学家 R·M·基辛说：田野工作是对社区及其生活方式从事长期的研究。从许多方面而言，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

要的经验，是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主要依据①。

实地调查被看作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②，甚至有人认为“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③。

笔者在中山大学学习民族学，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民族理论，在四川大学学习民族区域经济，以及在西南民族学院讲授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过程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族史、民族志等方面的理论，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比较系统和大量地掌握了有关康区藏族的地方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专著、课题、资料，做了较充分的文献准备工作。另外，从本人自1987年到西南民族学院工作以来，曾多次深入藏区考察，可以说对藏区比较了解。为了完成本课题，2002 年 4月到 8月，本人在所要研究的城镇进行了 5个月的实地调查。在调查一开始就试图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当地人们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的活动，考察这些领域所展示的文化及其变迁趋势。研究计划和调查问卷的设计，都是以当地能够实际观察和能够取得资料为基点和框架的。

在这次调查中，采用了以下各种研究方法：

1. 参与当地生活

一天又一天，笔者住在当地人提供的藏房里，或者与当

① R·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于嘉云、张恭启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0 年，第 21 页。

② C· 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97页。

③ 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21页。

地人一起进餐，或进入各种寺院，或参加学校的上课及各种活动，旁听法庭的审判，出席当地人的婚礼，利用每一次可能的机会参与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和当地人交朋友，和当地人一样遵守当地的各种规则，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样，笔者获得了大量生动、自然、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2. 访谈

访谈的方法很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对象之间或进行随意的谈话，或经过周密计划与那些对于城市生活的某些部分能够提供信息的人进行访谈。通过和这些人几个月的接触并进行询问，得到了几乎十分坦诚的回答。

3. 运用调查表和调查问卷进行调查

在没有到实地进行调查之前，笔者曾经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调查表和调查问卷。到了当地后，根据试调查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更加符合实际的修改，对被选定的对象，主要运用调查表和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在完成本课题的过程中，所有的数据、资料全部以此为基础，并运用其他资料进行佐证。

4. 数据与整理资料

尽可能地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数据，包括人口普查数据、城镇记录、法庭档案、学校记录、订阅报纸杂志记录以及各种年鉴记录等等。

在具体的课题写作中，尽量用民族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但有时为了保持民族学课题的特点而采用了民族志的描写手法。尽管全观性的民族志有它的缺陷，但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说：“在实验性的转换和批评的可能性里，我们把民族志理解为经验研究和写作的一种训练工具，它探索艺术和哲学关注的问题，但它的角度不是超社会的思辨，而是

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化的地方情境的独特刻画。[①]

三、重点和难点

（一）重点

本课题率先把四川藏区城镇化进程与文化及其变迁结合起来研究，在研究中重点解决以下问题：如何消除制约四川藏区城镇化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以加强中心城镇的能量集聚和辐射作用；如何加速推进四川藏区的城镇化进程；如何解决日益扩大和加强的城乡对流所产生的各种现实问题；如何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调适文化冲突，促进文化现代化；如何选择城镇化与民族化有效结合的模式；如何推动四川藏区城镇化和文化变迁的良性互动发展。

（二）本课题的难点

其一，开展关于城市化进程及相关文化变迁的研究，历时不长。虽然国外学者如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顾定国先生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中国乡村城市化等课题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国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尚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 90 年代开始投注这一课题。自 1992 年成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以来，尽管已取得不少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各期中），但由于现代城市化和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一直在进行过程之中，其变化相当迅速，因

① 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2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总体上说，国内有关方面的研究还跟不上现实变化的需要。多数研究处于跟踪状态，超前研究尚嫌不足，且缺少系统研究，大区域的系统观察和研究更为缺乏。就四川藏区而言，一方面，四川藏区城镇化进程起步晚、发展缓慢，能提供的现实经验和研究材料有限，难以进行归纳；另一方面，国内外有关研究刚刚兴起，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尤其缺乏运用民族学方法来研究都市化与文化变迁之间关系的成熟理论与方法。可见本课题无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其二，本课题面对的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特殊。四川藏区处在两块紧密相连、地貌特殊的地域之上。一是堪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一是青藏高原东缘断裂纵谷集中分布的川西高原峡谷区。世居在这里的藏、羌等民族都十分古老，其社会历史发展无不具有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面对这样一个地域广大、聚落分散、交通不便的特殊地域，不能不说给研究带来比较大的难度。

其三，尽管四川藏区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线条是比较清楚的，但仍然有许多方面至今都为人所不甚明了。如川西高原峡谷地带是一条历史民族走廊，历史上过往和栖居民族繁杂，由此而成为特殊的文化沉积带。这里发生了许多历史活动和文化变迁，迄今对之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论述并不多见，增加了本课题研究的难度。

其四，由于自然环境及历史的原因，四川藏区城镇文化的发生和生长受到诸多制约。现实发展形成的反差在四川藏区表现得相当突出，所产生的现代化冲击也相当强烈。人们既希望快速改变本地区的落后面貌，又希望能保持本民族文化和自然的原貌；既希望民族振兴，又担心民族文化流失；既希望大规模投入，又担心带来大规模破坏。在推进城镇化

的进程中，人们还普遍缺乏城镇生活的习惯和观念，面临城镇化潮流的冲击，难以及时地做出适应性调整。加之传统文化迅速被淘汰乃至消失，文化失落情绪蔓延，影响到应变能力，增加了适应性调整的难度，从而给城镇化带来了阻力，甚至给局部社会局势的稳定造成潜在的威胁。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研究本课题具有相当的难度。

四、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的选择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类社会具有多种构成要素。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家庭、企业、学校、国家、村落、城市、国民社会等都是构成广义的社会的要素，后 7 个即家庭、企业、学校、国家、村落、城市、国民社会等是狭义的社会要素①。但无论怎样看，当今所有的社会都可以分为两大社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即民族地区也存在农村和城市（镇）之别。

民族学以古今一切民族作为研究对象，而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现代社会有城乡分布之别，有各自不同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这些都是民族学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民族学不仅应当研究古代民族，也应当研究现代民族；不仅以传统的乡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应当以大都市或小城镇为研究对象。换言之，选择民族地区的城镇研究是民

①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杨栋梁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第 1～2 页。

族学、人类学的本职工作。正如阮西湖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民族地区，城市在保留和发展民族文化语言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城市集中着大量知识分子以及学校、传播媒介（报纸、电台）、科研机构等等。这些都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有利条件。但如何发挥这些有利条件，正是都市人类学家应该研究的”①

同时，本课题的宗旨是研究四川藏区城镇化进程与社会文化变迁，选择城镇来进行研究正符合题意，也符合四川藏区的实际情况。因为，相对而言，四川藏区的城镇数量少、规模小、经济水平低，辐射能力有限，城镇化进程对地处边远的农牧区的影响相对较小，选择乡村作为研究对象，不能够很好地揭示本文的主题。

因此，在考虑了上述因素后，笔者把调查地点选择在城镇。

(一)具体城镇的选择

指导选择研究地点的主要考虑是：第一，该城镇在藏区应当尽可能地有代表性；第二，它能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切片即一个完整而又独立的社区，以便进行全面的研究。

从第一点考虑出发，笔者认为该城镇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 气候适中，因为气候的差异往往会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2) 具有一定的增长率，能够保持一定的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3) 除藏族外，其他民族成分较少；(4) 具有浓郁的藏文化积淀，在藏区具有代表性。

从第二点考虑，笔者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因素： 1. 能反

① 阮西湖：《人类学研究探索：从“世界民族”学到都市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200 页。

映藏区城镇的普遍规模，既包括人口数量，又包括城镇规模。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绝大部分都只是小城镇（建制镇），因此，选择的研究地点应当是藏区的建制镇。另一方面，藏区城镇（城区）人口普遍较少，通常在一万人以下，因此，选择的城镇的人口应当在一万人以下。也就是说，所要选择的城镇既要是建制镇，其人口又在一万人以下。 2. 在当今信息交流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该城镇应尽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城镇，而不是卫星城。只有这样，才能作为独立完整的社区进行研究。

根据这些要求，笔者仔细研究了四川藏区的城镇，最后选择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县人民政府驻地更庆镇作为研究对象。

更庆镇所在的德格县每年 10月 3 日至次年 4月 30 日为冬季，为 209 天， 5月 1 日至 10月 2 日为春秋合季，无夏季，年平均气温为 6.5℃[①]，而整个四川藏区的年平均气温为 7.4℃。德格的气候与其他藏区的气候条件相似，可以代表在此条件下藏民族的生产、生活规律。

更庆镇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各种努力，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城镇发展也很快，城区从 2街 3巷发展到 5街 3巷，面积 4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也从建镇时不足 1500人发展到 2725 人。更庆镇的城镇人口数量和城镇规模在藏区城镇中具有代表性。

更庆镇远离中心城市（镇）。它距甘孜州首府康定 588公里，距四川省省会成都市 965 公里，距西藏昌都 320公

①四川省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德格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68页。

里。远离中心城市（镇）使其受到的辐射较少，使得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社区、完整社区来研究成为可能。

更庆镇具有浓郁的藏族文化。首先，德格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县境在藏族传统古地理概念中，属“多康六冈”中的“色莫冈”地区。县境龚垭乡喇格村发现的石棺墓群，证明至少在距今 2200—3000 年时，德格地区已有人群活动，《岭·格萨尔王传记》的主人翁就是德格县阿须草原人。其次，德格是康北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自唐代兴起的汉藏茶马古道，形成了经四川、青海、云南至西藏的贸易通道，即川藏、青藏、滇藏三条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自成都经康定、甘孜至德格，由岗拖或卡松渡过金沙江，至昌都入藏。青藏茶马古道，自玉树而南经邓柯由卡松渡过金沙江入藏。德格作为两条古道的交通枢纽，在茶马古道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具有丰富的古道文化资源。第三，德格藏传佛教康区教派和祖寺在藏区影响非常大。早在公元 7 世纪，德格已是藏族原始宗教——本波教（简称本教）在康区的一大中心，建立有本波教在康区的祖寺和最高学府登青寺等一大批寺庙。公元 9 世纪时，吐蕃赞普郎达玛开展灭佛运动，佛教在西藏被禁绝，少数僧人逃至德格境内，在金沙江边的邓柯等地传播佛教，逐步使佛教与这里的本波教相融合。从10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种本土化的新型宗教——藏传佛教开始在德格形成，并以德格为基地向西藏传播，在西藏建寺开派，使佛教重新在西藏兴盛起来。这便是藏传佛教史上“后宏期”的“下路宏法”。不少德格僧人成为“后宏期”各教派的开山祖师，如止贡噶举的仁钦贝、噶玛噶举的都松钦巴、宁玛派噶当巴德西等，都是德格人。他们在德格地区创建了许多寺院，德格因而成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等早

期教派在康区的发祥地和中心。第四，德格土司在藏区的影响非常大。德格土司在清雍正时，兼任更庆寺主，奉行兼容政策，对藏传佛教各个教派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使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在德格地区均有很大发展，他主持修建了德格印经院，广泛搜集各个教派典籍，鸠工刻板印行，对大小“五明”在康区的弘扬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德格是藏医药南派发祥地，德格绘画、书法在藏区颇具影响，德格藏语为康区藏语的标准语，等等①。德格文化所开创的各教派兼容并存，不同文化兼收并蓄的传统和坚忍不拔、勇敢精进的格萨尔人文精神，以及追求人天合一、至善至美的艺术风格，对康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成为康巴文化的精神内核，也使德格成为藏族文化三大发祥地之一。

选择更庆镇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城镇化带来的物质层面上的变化十分明显：先后建立的国有集体经济和个体工商业，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引进，公路运输、电信、互联网的出现，现代娱乐方式的流行，贸易的兴旺以及藏汉民族和睦相处的生活方式，族际交往的频繁等等。另一方面，城镇化滞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经济上没有现代工业，吃饭财政，贫富的悬殊，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宗教、礼俗观念等方面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此外，现代化城镇化带来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也能在这里得到比较明显的体现。

①参见泽尔多杰著《雪域康巴德格之最》、《德格——康北茶马古道的重镇》、《藏医药南派发祥地——古城德格》、《雪域康巴文化发祥地——德格》、《佛祖佛教与雪域藏传佛教暨德格发展概况》、《德格县岭·格萨尔文化资源调查报告》（未刊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